

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

曹均伟 方小芬·著

中国近代
利用外资活动

Zhongguojindai Liyongwaizi Huodong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利用外资活动

Zhongguojindai Liyongwaizi Huodong

曹均伟 方小芬·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

曹均伟 方小芬 著

责任编辑 辛 白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 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

装 订 上海西颜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1049—147—4/F·113

定 价 15.00 元

从购买国货做起！

北京纵横商务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许钢

历史可能在重演。曾几何时，外国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在“通商”的幌子之下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进行武力侵吞和瓜分。今天，海外某些跨国集团似乎正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大举侵占中国，以达到差不多相同的目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投资于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我们的民族产业尚缺乏足够的资金与健全的经营机制，暂时还难以全面与跨国资本进行抗衡。

跨国资本抢滩登陆中国的目的就是抢占市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海外资本中不乏有采用新殖民主义手段者，它们在“自由贸易、共同发展”的旗帜下，通过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渗透，力图在我们民族产业和民族素质中打开突破口，最终达到挤垮我们民族产业全面和永久占有中国市场的目的。

那些本不以为然的人们在亚洲股汇危机的狂风暴雨面前终于可以清醒了。跨国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海外投机商们猖獗的进攻，使善良的人们不仅感悟到了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特性，而且还领教了资本在追逐利润过程中那攻城陷池般

动的历史事实和演变过程；最后，分章节分析了近代借用外资和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概况、性质和结果，评价了它们的利与弊；此外，作为个案的深入研究，还专门论述了近代中国早、中、后期典型的实业借款以及铁路借款的历史。书中程度不等地论及马建忠、薛福成、刘铭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张謇、马寅初、翁文灏、张嘉璈、钱昌照，以及李鸿章、袁世凯、宋子文等近代人物的利用外资主张和活动，从一个侧面拓宽了对这些近代人物的认识。

与前几年发表的拙作相比，本书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充实了新的史料；摈弃了关于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的传统分法，关于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和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陈旧提法；调整了结构，避免了前后的重复，等等。当然，由于本书仍属阶段性研究成果，有关史料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有关问题也须进一步研究，加上笔者研究的时间和研究的水平有限，因此，本书仍可能是不太成熟的，尚待以后加以充实和提高。敬祈专家和学者们不吝赐教。

曹均伟

1997年6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半主权历史条件下的利用外资	(1)
第一节 半主权条件下对外经济的历史格局	(1)
一、三种殖民地不同的对外经济格局	(1)
二、半主权条件下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格局	(2)
第二节 半主权条件下利用外资的特性	(4)
一、近代利用外资的两重性	(4)
二、近代利用外资的复杂性	(6)
三、近代利用外资的曲折性	(7)
第三节 半主权条件下利用外资的开放性比较	(8)
一、半主权条件下的主动开放	(8)
二、近代中日两国主动开放的成败比较	(11)
第四节 半主权条件下利用外资的评价	(13)
一、近代利用外资的进步性	(14)
二、近代利用外资方式的适用性	(16)
三、近代利用外资的利弊两重性	(19)
第二章 清末利用外资的活动	(22)
第一节 近代利用外资活动的开端	(22)
一、清末利用外资政策和活动产生的原因	(22)

二、洋务派的利用外资主张和政策	(25)
三、近代利用外资活动的兴起	(28)
四、洋务运动中利用外资的成效	(32)
第二节 甲午战后利用外资活动的发展	(37)
一、甲午战后利用外资的历史背景	(37)
二、甲午战后的利用外资政策	(38)
三、甲午战后借用外资的史实	(42)
四、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兴办	(44)
第三节 “光宣新政”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	(46)
一、“光宣新政”	(46)
二、“自开商埠”的政策	(50)
三、“自开商埠”与利用外资	(54)
四、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和调整	(57)
五、“新政”期间大借外债	(59)
第三章 民初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	(62)
第一节 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政权的利用外资	(62)
一、辛亥革命后利用外资的历史条件	(62)
二、孙中山及其同仁的“利用外资”主张	(65)
三、孙中山的利用外资活动	(71)
四、南京临时政府及南方革命政权的借用外债活动	(73)
第二节 袁世凯政权的利用外资活动	(77)
一、袁世凯政权实行开放的背景	(77)
二、袁世凯政权的引进外资政策	(85)
三、袁世凯政权的借用外资活动	(90)
四、袁世凯政权时期的中外合资企业	(95)
第三节 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的引进外资活动	(100)

一、北洋军阀混战时的经济形势	(100)
二、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的实业借款	(105)
三、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外合资企业	(112)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	(123)
第一节 南京政府统治十年的利用外资.....	(123)
一、南京政府统治十年利用外资的历史背景	(123)
二、南京政府统治十年的利用外资政策	(126)
三、整理与清偿外债	(131)
四、南京政府统治十年借用外资的活动	(136)
五、南京政府统治十年的合资企业	(139)
第二节 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利用外资.....	(144)
一、抗战时期及战后的严峻形势	(144)
二、国民政府在抗战及战后时期的利用外资政策	(147)
三、抗战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	(151)
四、抗战以后的引进外资活动	(156)
第五章 近代借用外资.....	(160)
第一节 近代借用外资的史实.....	(160)
一、清末借用外资的史实	(160)
二、北洋政府时期借用外资的史实	(167)
三、国民政府时期借用外资的史实	(171)
第二节 对近代借用外资活动的再认识.....	(179)
一、外资与外债的区别	(179)
二、外资的善与恶之分	(180)
三、平等与不平等之辨	(182)
第三节 近代借用外资的利与弊.....	(184)
一、近代借用外资的弊害	(184)

二、近代借用外资的收效 (189)

第六章 近代实业借款 (195)

第一节 上海轮船招商局借款 (195)

一、轮船招商局首次借款 (195)

二、轮船招商局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两次借款 (198)

三、轮船招商局最后一次借款 (200)

第二节 汉冶萍借款 (201)

一、汉冶萍早期借款 (203)

二、汉冶萍中期借款 (205)

三、汉冶萍后期借款 (208)

第三节 资源委员会的易货偿债 (210)

一、资委会利用外资的设想 (210)

二、资委会借用外资和易货偿债的活动 (212)

三、资委会易货偿债活动的积极意义 (216)

第七章 近代铁路借款 (219)

第一节 清末的铁路借款 (219)

一、“借债筑路”的争论 (219)

二、清末“借债筑路”三阶段及其特点 (221)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铁路借款 (227)

一、北洋政府时期新借的铁路外债 (227)

二、北洋政府时期旧有铁路续借的外债 (230)

三、北洋政府时期铁路借款的特点 (235)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铁路借款 (239)

一、铁路旧债的整理 (239)

二、国民政府铁路外债的新举措 (241)

三、国民政府举借铁路外债的活动 (244)

第八章 近代中外合资企业	(250)
第一节 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概况.....	(250)
一、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演变	(250)
二、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地区分布	(252)
三、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行业结构	(254)
第二节 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性质和地位.....	(256)
一、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性质	(256)
二、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地位	(258)
第三节 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利与弊.....	(259)
一、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弊害性	(260)
二、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收效	(262)

第一章 半主权历史条件下的利用外资

第一节 半主权条件下对外经济的历史格局

一说到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人们便会认定它是一部深受外国资本侵略和压迫的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从 19 世纪中叶起，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受到外国资本侵略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过程中，对外经济关系的畸形发展主要是通过外国殖民者以暴力的手段促成的。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并依据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对中国进行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侵略。甲午战争以后，外国列强根据《马关条约》，使其对华的资本侵略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于是，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侵略逐步取代了商品侵略，翻开了外国资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悲惨史页。

一、三种殖民地不同的对外经济格局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近代中国与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是按照“资本输出——资本输入”的格局，即殖民主义宗主国向殖民地附属国输出资本，殖民地从宗主国输入资本的局面，形成殖民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其实，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

近代世界史上殖民地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像东印度那样的奴役土著殖民地；另一种是像美国那样的移民垦殖殖民地；再一种是

像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这三种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宗主国的对外关系并不是一种模式。

东印度是英国的奴役土著殖民地。英国侵占印度后，一开始就实行独占政策，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印度无条件地接受英国的“资本输出”。

美国是英国的移民垦殖殖民地。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一开始并没有实行独占政策，只是当美国经济发展起来，与其发生冲突时，才对美国的贸易和航运实行独占政策，而对那里的生产仍未实行独占。这就是说，美国的移民垦殖殖民地还没有形成像东印度那样完全的“资本输出——资本输入”的对外经济关系。

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尚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社会，外国列强还不可能处于独占的宗主国地位，除沦为殖民地的部分地区丧失主权之外，处在半殖民地的部分地区仍保留着一定领域的“主权”。因此，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它在受到殖民侵略和压迫的同时，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在一定的范围内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被动或主动地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联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工艺和机器设备乃至利用外资等活动。

由此可见，三种殖民地存在三种不尽相同的对外经济关系。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社会，自然与东印度那样的奴役土著殖民地和美国那样的移民垦殖殖民地形成不同的对外经济格局。

二、半主权条件下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格局

近代中国在“半主权”条件下的对外经济关系不同于完全殖民地国家的情形。印度是典型的完全殖民化国家，早在 16~17 世纪期间，它的门户就被打开，到 18 世纪中叶被英国征服为奴役土著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在印度进行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其攫夺所得构成了 18 世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对此，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开

设独占性的专营公司,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征服土地。欧洲殖民者在东方开设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独占东方国家的对外贸易,干涉它们的生产,实际上将它们视为自己的“领地”和“领岛”。^① 马克思也认为,英国在印度担负着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的使命,但在变印度为殖民地的整个 18 世纪内,“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② 由于完全殖民地化的印度没有半点主权,它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英国殖民者手中,因此,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只能形成“资本输出——资本输入”的格局。

近代中国在“半主权”条件下的对外经济关系也不同于摆脱殖民统治国家的情形。像美国早期是英国的移民垦殖殖民地,由于英国将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移植过去,再加上美国本身没有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束缚,殖民地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就冲破英国的限制发展起来了,最后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尽管马克思仍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③ 但美国在摆脱英国统治之后能很快地实行开放主义政策,形成“资本输出——引进外资”的对外经济关系,并取得了成效。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美国连贯国疆极端之铁路系统,大部分皆由外资敷设。在美国之富源未开发以前,早期敷设之铁路,事实上亦不得不利用外资也”。虽然美国以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其贫穷与我国相同”,但它自主地开展利用外资后不仅“并未因此受害,且因此获巨利,臻于富强之域”。^④

在半殖民地半主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因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像完全殖民化的

① 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 204~2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4 页。

③ 《资本论》第 1 卷,第 833 页,注 253。

④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90 页。

国家，仍保留着“半主权”，又不像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能实现政治独立。所以，既按照“资本输出——资本输入”的格局，又依照“资本输出——引进外资”的格局，与外国资本发生联系。这就告诉我们，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史是一部外国资本侵略与近代中国利用外资并存的历史。这是既合乎逻辑又合乎历史过程的结论。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性决定了它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一部外国资本侵略的历史；而近代中国社会的半主权特性又决定了它是一部利用外资的历史。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就要承认这种双重格局并存的史实。否则，就无从讨论这一问题。

第二节 半主权条件下利用外资的特性

承认近代中国存在利用外资的历史，是研究近代利用外资的前提。对于历史问题的思考往往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启示。探讨近代利用外资问题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今日中国的利用外资。但是，今非昔比，今天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地开展利用外资的活动，而近代中国的利用外资是在半殖民地半主权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有一种意见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文明是无国籍的”，开放门户，传播文明越早越好，把今天的开放政策与旧中国的“开关”政策，将往日的引进外资与今日的利用外资，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因此，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敞开国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似乎无时代的不同。其实，近代中国的利用外资具有以下不同于现代中国利用外资的特点。

一、近代利用外资的两重性

这种两重性主要表现于近代中国一方面丧失部分主权受到外国资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利用未丧失的部分主权开展着为我所用

的引进活动。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对华进行经济侵略，它们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独资”、“合办企业”和间接投资的方式——“贷款”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加快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政权的力量一方面处处防范和抵御外国资本入侵，另一方面则通过“借债”、“合办企业”、“外商独资”的形式来引进外资。于是，就形成了中外双方以同样的途径进行资本入侵和引进外资的双向局面。

从举借外债来看，一部分外债如军事性外债、政治性外债，尤其是赔款性外债是外国列强强加给旧中国的，因此是侵略性质的外债；而另一部分外债如实业性外债，不少是旧中国政府主动引进的，因此具有利用外资的性质。显然，旧中国成立的外债存在外国资本侵略和利用外资的两重性。即使是实业性外债，也有平等和不平等的双重局面：一部分债款属于正常的借贷范围，低息且无任何苛刻条件；而另一部分债款不仅息率高，而且附加苛刻的条件，明显地带有资本侵略的性质。

从“合办企业”来看，这种两重性表现为：一部分企业是在旧中国有关章程和条例的规定范围内被允准成立的，属于利用外资的范畴；而另一部分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成立的，外国列强利用这种形式“到非中国人不得开办实业的地方，开办非中国人不能开办的企业”^①，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侵入旧中国内地的一种手段。有的“合办企业”，尤其中日合办企业本身是通过暴力或强制手段建立的。

旧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双重局面还表现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存。在半殖民地的地区存在半主权，故而还可以开展利用外资的活动，而在殖民地地区如日本侵占时的东北和台湾地区就没有半点主权可言，所以也就谈不上外资的引进。即使在那里

^① 张雁深：《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5~16页。

出现的伪政权的“借款”或形式上的“合办企业”，也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属于侵略性质的投资。

二、近代利用外资的复杂性

既然旧中国存在外国资本侵略和外资利用的双重格局，这也决定了近代中国对外资本关系的复杂性。不少在华出现的“合办企业”或成立的外债，就很难一下子说清是外国资本侵略还是外资的引进和利用。如在“铁路借款”中既有旧中国政府主动引进的，又有外资强加的。又如“合办企业”更是存在由中方允准举办和由外方强行兴办的复杂情形。

近代中国开展利用外资的活动既有来自外国列强强权政治的压力，又有来自国内闭关自守的顽固势力的阻挠，于是，在实行主动的开放，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一方面要防范和抵御外资的渗透和压迫，另一方面又要冲破国内闭关主义的阻挠。所以，近代中国开展为我所用的引进活动是在十分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展开的。在半殖民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一部分主权的丧失，近代中国引进外资在客观上为外资的入侵提供了方便，在某些时期、某些范围很难实现抵御外资入侵的主观企图，这就成为闭关主义的顽固派用以反对对外开放的口实，一些利用外资的主张者和推行者如清末的刘铭传、民初的刘揆一等先后遭到攻击而辞官。然而，近代不少官员和有识之士又从“落后挨打”的教训中认识到，与其闭关自守，“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开放门户”，开展为我所用的引进活动，以实现增强国力，抵御外资侵略的目的。因此，一部分原先视外资如“洪水猛兽”的官员或实业家，如张之洞、张謇等纷纷转变立场，竭力主张“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并先后为清末民初制订了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开放主义政策。

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一些旧中国的官僚、军阀或财阀们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活动中收取贿赂，拿取回扣，中饱私囊的丑恶行

径。这又使近代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增添了复杂因素。

三、近代利用外资的曲折性

从近代引进外资的整个活动过程来看,它经历了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三起三落”的曲折历史。一开始旧中国政府都煞费苦心地制订出一整套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措施,但每每在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时都付出了代价,甚至后来都导致由“利”转化“弊”的结局。这种由“利”向“弊”转化的过程反映了近代开展利用外资活动的曲折性。

在半殖民地的历史环境下,无论是清末时期的引进外资活动,还是民国时期的外资利用活动,都是在曲折起伏的过程中开展的。从 19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实业借债”和“借债筑路”热潮到甲午战后“实业救国”浪潮中的利用外资活动,再到“清末新政”时期实行的主动开埠,引进外资之举措,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末引进外资一浪又一浪的演进过程;从民初兴起的“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热潮到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政府“经济建设”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再到抗战胜利之初引进外资的举动,我们同样也可以寻找到民国时期利用外资活动此起彼伏的曲折轨迹。

从利用外资主张的提出到利用外资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的转化过程来看,它也表现出曲折的现象。在近代,最早提出“利用外资”主张的是洋务派属下的洋务思想家,如马建忠、薛福成等,但他们的地位不足以把利用外资的主张付诸实践,而只有得到身居高位的洋务派首领如李鸿章等的采纳,才能使这些主张得以实施。而李鸿章提出“利用外资”的政策则是接受和采纳了马建忠、薛福成等人的“利用外资”主张。

大实业家张謇在民初任农商总长期间制订的一系列“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政策,曾一度得到袁世凯政府认肯;但由于袁世凯